三访蔡廷锴故里



彭绮文

蔡廷锴将军是民族英雄，他因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而名留青史。他也是我的故乡广东罗定市人，出于对故乡先贤的崇敬和爱戴，我曾经三次访问廷锴故乡——罗定市罗镜镇龙岩乡。



廷锴故居对联

1982年暑假，我准备读大二。中文系的许桂燊教授建议我利用假期去蔡廷锴将军的故居，收集一些关于将军的资料。这件事恰好得到我中学母校罗定中学当时的副校长区映寰支持，他写信给廷锴小学的张校长，请他接待我。我坐汽车到罗镜镇，然后骑自行车一个小时到达蔡廷锴的故乡龙岩乡，找到张校长，把区校长的信交给他。张校长看完信，询问我的来意，就带我去廷锴小学，从他简陋的办公室那简单的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是人们赞颂廷锴的一些对联和诗词，还有一些纪念活动的照片，我估计这些资料的原始价值不大，于是，就请求张校长带我去看廷锴故居。

张校长带我到了一个村庄，村前有一大片莲藕，田田的莲叶像夏雨中一把把小伞，有的莲叶还有雨珠停留，像一粒粒晶莹的珍珠。莲塘散发着清香。如此秀美山村，正是人杰地灵。校长带我走进一间没有大门的、外墙脱落的白灰屋，其中有两间房子用简陋的锁头锁着。张校长说，只有这两间房子是由蔡将军的家人保管，其他房子都住着村民。因为没有收集到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加上看到将军的故居破旧凋敝，我心里很难受。张校长见我有点失落，就说带我去看廷锴将军非常喜欢的“东南一景”。

来到一处土坡，我看见对面山丘上有些流水，张校长说，这就是“东南一景”。此景色曾因《廷锴自传》中描述有瀑布而闻名，但我眼前的景色，既不险，也不峻，更称不上巍峨，甚至不比环绕罗镜镇周围的山高，瀑布也只有一尺宽的水流，它与我见过的奇险和壮观的景色无法比拟。但为什么廷锴将军在他的自传中如此赞美这一景色？难道这景色有将军深藏的故事或抱负？

此次访问廷锴故居，我收获不多。也没有看到长辈们告诉我的将军留给故乡的两件物品：一是他作战佩戴的军刀；二是他的血衣。血衣是将军负重伤，鲜血渗透他的衣服，凝固后脱不下来，他的副官连着将军的皮肉把衣服揭下来的。将军把这两样物品留给家乡人，是让人们记着历史的教训。虽说没有看到这两件宝贵的物品，但我却感到收获了一种精神。我成长在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自我张扬并存的年代，选择什么人生观意味着追随什么样的理想，我去朝拜英雄，冥冥之中感受濡染到了英雄对国家和民族勇于担当的情怀。

1999年，我第二次去廷锴故居。彼时罗定市设立了廷锴将军纪念馆，陈列廷锴抗战及其为国戎马一生的传奇。这次去廷锴故居，是罗定市政府组织中山大学罗定籍的教授回乡调研，特地安排的。所有教授中，许桂燊教授兴致最浓，因为他研究过十九路军，掌握十九路军抗日的大量资料，他饶有兴致地给我们讲述淞沪抗战的故事。因为十九路军大部分将士是广东人，尤其以罗定人居多，在与日军开战前，很多将士都明白，能活着回来就是造化。因此，大家都非常怀念家乡，希望开战前能吃上一顿家乡的饭菜。廷锴将军很懂将士们的心理，于是叫伙夫做一个菜，就是罗定豆豉蒸猪肉，豆豉是罗定著名的特产。吃着家乡菜，将士们热血沸腾，立誓要与日本侵略军决一死战。因为日军的马队很厉害，于是，将士们想出扫马脚一招。日军马队的马蹄穿着铁掌，怎样令马队站不稳呢？将士们想起做豆豉用的圆滚滚又坚硬的黄豆，于是将士们在日军经过的路上撒下黄豆，果然，马队经过时很多马因为踩了黄豆滑倒跪地，战斗力大减，这时上海民间组织红枪队就出来砍马脚。如果马脚被绊，战马同样不能摆威风。将士们从猪肉想到困猪的猪笼，马脚踏进猪笼，就会被困住，于是，将士们把猪笼丢在马路上，果然日军马队经过又中招了。为了抗击日军，传闻闻北的黄豆和猪笼都全部被用光了。

我们计划在廷锴故居参观一小时，只见许教授仔细端详展览馆里的每一张照片，细细品读每一段解说词，琢磨每一场战斗的情景，还耐心地做笔记，直到接待人员反复提醒，他才不舍地离开。

许教授虽然是罗定籍人，但他在罗定生活的时间很短，只是抗战时随母亲避难回罗定住了一年多，那时他还不到三岁。起初我不太明白何以他对将军如此崇敬。这个疑问在我第三次访廷锴故里时有了答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我随罗定市社科联主席和宣传干事前往廷锴故乡，访问廷锴副官翁云廷的儿子翁德和夫妇，了解到了廷锴将军除了英勇抗日外，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淞沪抗战后，廷锴回到广州，看见他的两个弟弟的住处用茅草搭成，不能挡风遮雨，于是，廷锴在文德路附近买了房子，给弟弟居住。廷锴少年时经常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捉鱼摸虾，为了谋生，他曾多次与后来成为他副官的翁云廷一起，去帮办喜庆事的人家做客郎。翁云廷参军不久，廷锴作为团长与之在广东江门重逢，自此云廷就开始跟随廷锴。廷锴多次负伤，均是云廷鼎力相救。在福建时，一次廷锴上山头瞭望，突然被敌方机关枪射中腿部，立刻倒地，是云廷紧急背他去医院救治。有感于云廷的忠心救护，廷锴感慨地说：只要有蔡廷锴一天，就有翁云廷一天。

1946年，云廷因为想过平静、安宁的日子，辞别廷锴回乡居住。当时罗定县府请云廷负责守护粮仓，廷锴那时已追随共产党，他密信告知云廷，守好粮仓的粮食，一粒都不能外运出境支持国民党，等待共产党的部队来接收。云廷果然没有按照罗定县长的命令外运粮食，以致获罪被监禁。幸得到廷锴亲人的声援才被释放。廷锴与云廷推心置腹，他交待云廷去劝说自己的女婿辞掉在国民党的官职，投靠游击队。解放后，云廷和许多从国民党军队走进新中国的人一样，被扣上“五类分子”的帽子。1958年，廷锴回乡，云廷戴着在田间劳作的“大眼帽”来见他，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见将军还戴这样的帽子？云廷一语相关地回答：我本来就是戴“帽”。廷锴立刻明白了，于是对当地政府说：如果云廷是“五类分子”，我蔡廷锴就是“六类分子”，因为云廷所做的一切，都是听从我的。不久，云廷“五类分子”的帽子被摘除了。廷锴当时是北京的高官，但他仍然牵挂着昔日的老部下，与之荣辱与共。云廷年老时，还经常收到廷锴从北京的来信，他的家人感到好奇，问来信讲什么，云廷回答说，廷锴只与他一个人讲，没有与其他人讲。不但不告诉家人信的内容，还看完就把信烧了。至云廷年老患病，廷锴虽已不在人世，但其夫人罗西欧女士依然多次寄钱回罗定给云廷治病，还寄学费支持云廷的孙子读书。

廷锴虽然战功显赫，但他在乡亲面前仍然很谦卑。他骑马回乡，在路上遇着乡亲，不管是否认识，也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甚至是捡牛粪的，他都立着马，给乡亲让路。因为罗镜镇是穷乡僻壤，能读书的人不多，廷锴意识到没有文化，难以服务国家，于是他出资在乡兴办小学、中学；为改善乡亲看病难的问题，他建医院；为了让乡亲有娱乐场所，他还兴建公园，为了让乡亲出行方便，他建设桥梁，这些工程，目前还在使用。

廷锴对乡亲很体贴，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必定通知乡亲去爱群大厦相见，他接待乡亲的第一件事，就是安置他们先去饭堂吃饭，因为他知道他们穷、饿，总是待到乡亲们吃饱饭后再叙旧，只要是他熟悉或是记得的乡亲，他都会问及。廷锴离乡多年，仍惦记故乡，他多么热爱故土和亲人，他在战斗间隙回到宁静的家乡，享受短暂的安宁和幸福，哪怕看见平凡的山丘流水，也会情不自禁地冠以美名。由此，我明白了许桂燊教授对廷锴将军的崇敬，也明白了“东南一景”的由来。

我三次访问廷锴故里，亲眼看见廷锴故居从只有两间破旧的房子保存物品，到设立纪念馆，再到现在筹资三百万元继续完善建设的过程，一次比一次更真实地了解廷锴将军对故乡的深情，对平静幸福生活的向往。将军故居的广场立了一尊骑马征战的雕像，将军威风凛凛，配枪坐立于马上，仿佛他的英灵至今还在守护祖国大地。

愿将军的精神作为我们民族的财富，得到更好的传承。

高校任教：杏坛耕耘梦想的人，看懂现在，明确未来

——2015年中山大学入职新教师岗前培训讲座文稿(三)

中山大学外国应用语言学教授　教育部审定资格的教师培训师　夏纪梅

(上接本报346期第4版)

4.4 师生关系是“师道尊严”还是“教学相长”？

“师生关系”是教育的黄金原则。进入21世纪以来，“师道尊严”越来越受到“学习型社会”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挑战。学生的知识来源、信息渠道，因为智能手机和网络媒体，触频信息不但广泛迅速且随时随地“掌握手中”。“老师难当”主要表现在不能轻易得到学生的尊敬和好评。今时今日，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不得不以利益关系思考：教师和学生，究竟谁成就了谁？不就是相互依赖的教学关系，相互利用的价值关系，相互成就的人才发展效应吗？此外，面对身处“叛逆年龄阶段”的大学生，教师要想赢得他们的认同，需要应用现代教育理念和心理战术。例如，心理需求：付出就要回报，如何让学生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所得到的回报，有一种“明白账”评价计分法，审辩式思维教学中让学生参评，观点与他人不同者得1分，理由准确充分得2分，发现他人漏洞并能辩论清楚得2分。这种“分数刺激”比卷面死题得分要更显回报价值和效应。可以将这样的课堂得分列入形成性评价，业绩化考核，但需要专业化导学导做导评的设计。又如，心理特征：青年人的叛逆心态本能是“你让我做的”我偏偏不做，“我想要做的”我才做。因此，教师和学生需要找到“契合点”“接近点”，给学生机会选择，自主决定做什么、怎么做、自己做，把握教育规律和人本规律，做活教学设计，把控课堂。现代教师的高明之处在于精于“偷懒”，善于“利用”，即不代劳，不做知识保姆，不用“我讲你听”的方式，目的是让学生真正学到真东西，让学生彻底做学习的主人，课堂的主人，课程的主人。

现代师生关系早已经改“一桶水”与“一杯水”的关系为“火把”与“火种”的关系！“教育不像工业而像农业”(北大校长林建华2015年)，教师不要把学生当做学习流水线上一个一个的模子，而要当成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教师不是将一桶水往一个个空杯子里注水，而是给一个个脑袋提供“脑蛋白”和给一个一个思想火种“浇油”，实现个性化教育。课堂要成为教育生态园，生态园里的生态因子是理念阳光，环境土壤，思想肥料，学生种子，教师园丁，活出精彩。

记得中山大学电视台曾经以“师生关系”为题采访过我，我和学生相处的感受心得是：以生为本，为生而为，爱生如己，育生为人。归纳起来，建立师生10种关系，产生10种效应，明白1个真理性命题：**1)施爱和受爱的关系，相互“爱恋”的关系。**世界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说过“教育是恋爱他人成长的事业”。我把师生关系视为“有情有意的学习伙伴式的恋爱”、“母子情节般的亲情爱”、“因为对教学如痴如醉所以对教学对象爱如己出的职业爱”，相信学生爱上你这个人，才会爱上你教的课。教师爱学生，才会倾情倾力智慧地求爱，示爱，施爱，会爱，这是“爱情效应”。**2)共同发展的关系。**学生在我心头上，我在学生心底里，我和学生一起成长一起精彩！这是“磁场效应”。**3)一棵榕树千条根须的关系，一树成林，这是“榕树效应”。4)一个大脑和群体大脑的关系，这是“链条效应”，“齿轮效应”。5)园丁和种子苗木的关系。**教育理念是阳光，课堂环境是土壤，教学方法是耕作技术，教学阶段是耕作季节，教师是耕耘人，学生是种子和庄稼，园丁要关注庄稼的生长状态、生长环境、生长条件、水分、肥料等的适度适量。这是“生态效应”。**6)供需关系。**学生是交学费的顾客，教师是商家，课程是产品，教学方法是营销，教材是产品说明书，考试评价是质量检查。在这个关系链条上，学生的口碑反馈，教学的效果声誉，学校的品牌名声显示“市场效应”AIDA(唤起注意力attention-引起兴趣interests-产生欲望desire-采取行动action)。**7)他我关系。**人的成长规律和心理需求效应CLA(care关心，love关爱，attention关注)。**8)一桶水和一条江的关系，流水效应。9)互动关系。**互相刺激，互相感动，互相补充，互相学习，互相释放，互利双赢效应。**10)恩德关系。**分不清谁该谢谁，教师助人发展，学生的发展反过来反哺教师的发展，学术共同体，丰富人生，受益终生。终身发展效应。真理命题：谁与谁的关系，谁谢谁的效应取决于：理念、态度、立场、方法、需求、价值观等。“新教育”的定义是“提高教育过程中人的生命质量和幸福指数”。因此，现代师生关系不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而是一起享受教学过程的快乐人。学生读死书往往是教师教死书的结果。学生怠学往往是教师厌教的结果。对学生要多采用鼓励法，不要轻易使用惩罚法。严要严而有道。爱要爱得得法。教师教学要目中有人，不能照本宣科，自管自讲。大学教师不能只管自己的科研不管学生的前途，对不起自己的职业“上帝”生存的“饭碗”。我们想听到学生说：“老师，你的课很特别，你的教学风格很特别，你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你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教师时常问问自己：“我给学生什么了？学生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了？我从学生那里获得什么了？”

不是结束的结束语

新入职的大学教师一开始就要把自己放入有竞争的岗位和环境，而不是一开始就追求期待安宁稳定。有挑战才有精彩。大学教师的职业发展期大致分为入职期/转型期，困惑期/挣扎期，掏空期/瓶颈期，应变期/奋斗期，发展期/上道期，成就期/成果期。大学青年教师要通过适当必要的规划，计划和策划，力争教学和科研两手硬，当好新时代新教育新常态下的培养人才的人才，向“学术达人”和“精神富人”进阶。成长成才需要悟性，经历开悟，感悟，觉悟，醒悟，领悟，顿悟，深悟，妙悟，快悟，早悟，大彻大悟，不要怕失误，错误，要walk必有fall。成果来自行动，要现场行动，即场行动，快速行动，反复行动，多种行动，每天每周行动。行动要有目标导向，目标细化，目标落实，要有效利用时间特别是假期。大学是孕育学术理想的地方，作学术是注定要专注寂寞的，真正的学术研究的艰辛一定不是普通大众所能理解的，包括家人。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场时提出的思考题“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育什么人”。新教育的传道是传学业之道，处世之道，为人之道；授业授的是学业、专业、职业、事业；解惑要解知识之惑、科学之惑、人生之惑、社会之惑；育人要因材施教，个性化栽培，育才更要育人，不育“合格的废品”。

大学是链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大学的学要学什么，怎么学，为何学？要让学生喜欢学，善于学，有效地学，坚持学，师生同学。大学的路是学习之路，自己设计的路，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的路，从做过，到做好做精；从敢做，到精做善做；从做实到做好。让教育理论从书架上走进心里，让培训从讲座走进课堂实践。“爱”是最好的教育，“学”是最好的发展，“做”是最好的进步，践行理念，实现梦想。让我们组成学校给力，学院助力，老师努力的三方合力，将Vision，passion，action相结合，将Ambition，ability，action，achievements相贯通。“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有坚持才有希望！”(超级演说家2015年5月2日，中国传媒大学90后大学生追随拯救传统艺术评书之梦发自内心地呐喊，赢得评委的全票支持)。想成功的青年人：以“中国梦”为目标，以“中国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中山校训”为路径，在这所有历史、有地位、有威望、有影响的名校筑梦！追梦！圆梦！

最后，祝愿大家：Hold住你的大学！大学路径始于足下！忠于学术，立己达人！我等着大家的好消息！

学术空间

一部客观真实的陈寅恪传记

张荣芳

(上接本报345期2版)

第四，真实地记录了陈寅恪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和对教育作出的卓越贡献。

以往对陈寅恪的研究，对其学术研究成果关注较多，而对其在教育上的贡献，则相对薄弱。其实陈寅恪的一生表明，他首先是老师，其次才是学者。他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和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他将中国传统私塾、书院和西方学校教育学生的长处，加以熔铸，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和独特的教育方法。把自己广博无涯的学问融入教学内容之中，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由发挥的创新能力，把学生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甘当人梯，全力扶掖后学。因而培养了众多日后成为贡献卓著的文史大家如季羡林、周一良等。本书对此均有详细记述，弥补了学术界对这方面研究之不足。

第五，真实生动地记录陈寅恪在中山大学的故事，澄清了一些不实的传闻。

1943年，陈寅恪在桂林广西大学任教。6月30日，陈氏作为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特约教授，冒着被日机轰炸的危险，前往临时迁至广东北部山区小县坪石的中山大学讲学。他在坪石停留一个星期，讲了五个专题：“五胡问题”、“清谈问题”、“魏晋南北朝读书方法之‘合本事注’”、“南朝民族与文化”、“宇文泰及唐朝种族问题”。这自然给迁到山野的中山大学送来了学术大餐。他当时大概没有想到，以后会在中山大学度过后半生。

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应陈序经之聘来岭南大学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岭大与中大合并，陈氏改任中大教授，直到1969年10月逝世，在广州生活了20年。康乐园的风风雨雨，影响着他的生活、教学和研究。

一方面他享受着“国宝”礼遇。得到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广东省的领导陶铸、中山大学领导冯乃超以及广东省负责高校思想工作的杜国痒等的关注与安排，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历史研究》编委、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山大学校务委员等职务。生活上享受着最好的待遇，配备他满意的学术助手，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还给予各种特殊照顾，陶铸还指示有关部门为他配备最好的收音机，以便收听他最喜欢的戏曲节目，在跌倒骨折之后，由国家出钱请三个护士在家里日夜值班照料等，这些待遇在中大乃至全国学术界传为美谈。陈寅恪在康乐园深居简出，在家里接待来自京城的高官，如林伯渠、陈毅、朱德、康生、胡乔木、周扬、郭沫若等；也接待了不少来自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老朋友和学生，如章士钊、李四光、张奚若、陈君葆、吴晗、季羡林、蒋天枢等。解放初期的几场政治运动没有冲击到他，他的心情是舒畅的，1957年春节，他撰一副春联贴于住宅东南区一号：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陈寅恪有“教授之教授”之称，对此在中山大学有真实的记录。历史系每年迎新会上，系主任刘节向学生介绍陈寅恪，都恭敬地说：“陈先生是全国知名学者，教授中的教授。”这一称谓名符其实。当时历史系许多老师如梁方仲、戴裔煊、蒋湘泽、端木正、谭彼岸、陈锡祺、全应熙、周连宽等，当时已是成名的学者，都来听陈先生的课，与同学们坐在一起，认真听课记笔记。比如著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二级教授梁方仲，从1953年至1955年，先后听了陈寅恪“两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证史”两门课，记下两大本长达百页的笔记。笔记“笔迹工整，极少涂改，讲课人脱口而出的引文和诗句，一一照录，准确度极高。”“每堂课均标明听讲月、日和星期，因事缺课必注明原因。”足见其听课之认真。中国近代史及孙中山研究专家陈锡祺在迟暮之年，对儿子回忆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跟学生一起听陈寅恪上课，……陈寅恪学问很好，人也很好。”

另一方面，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席卷全国，陈寅恪昔日的朋友、同事、学生或助手被划为右派，他自己被划为“中右分子”。1958年开展史学研究必须“厚今薄古”，马克思主义要占领史学陈地，要压倒资产阶级学者的运动。陈寅恪被推到了被批判的前列。首先从中山大学学生贴大字报开始，席卷到全国的一些报刊公开发表批陈的文章，全盘否定陈氏的史学思想、治学方法及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对这种胡乱的批判，一些老师是不满的，如梁方仲公开说：“乱拳打不倒老师傅”，要青年老师不要跟风起哄。又例如历史系要召开批判陈氏的大会，刘节冒着风险到陈家通风报信，使陈氏有思想准备。这场风狂雨骤的政治运动，使陈寅恪的精神受到严重的伤害。鉴于有些大字报说他“贻误青年”，他向校方提出：“教书30多年，不意贻误青年，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决定不再开课，准备迁出中大。”助手黄萱劝他复课，他沉痛地说：“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的。”这是多么伤心的话啊！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陈寅恪像全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了虐待，晚景十分凄凉，家中只留下体衰多病的两位老人。他预先给妻子唐筼拟一副挽联：“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陈寅恪夫妻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清贫一生，他虽欲远离政治，而“四人帮”的政治却不放过他，最终受迫害而死。

陈寅恪逝世后，在国内，真正从学术文化的方位来认识、了解、研究陈寅恪，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山大学在这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88年、1994年、1999年三次召开纪念陈寅恪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出版了三本论文集。在陈寅恪故居(东南区1号)建立了“陈寅恪纪念室”。胡守为在历史系开出“陈寅恪著作研读”的课程，让青年学子认识、了解和学习陈寅恪。2001年由陈寅恪女儿，我校化学系副教授陈美延编的《陈寅恪集》十三种十四册，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3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十七日)，是陈寅恪113岁诞辰，江西庐山植物园在新建的陈寅恪夫妇墓前举行了简朴的落成仪式。中山大学在发来的贺信中说：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研究学问，终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严谨治学，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气质。”“先生的学识与人品均堪称后人之典范”，“先生的事迹为中山大学的历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为拥有先生这样大师而感到无上光荣。”



第六，客观地辨析了坊间流传的关于陈寅恪的“可爱而不可信”的传闻。

对于陈寅恪由谁推荐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授，坊间有三种说法：一是胡适推荐说；二是梁启超推荐说；三是吴宓力荐说。前两种说法，固然可爱，却未必可信。作者根据《吴宓日记》、《吴宓书信集》和各种来往文件中，考证出是吴宓力荐陈寅恪到研究院任导师，“是吴宓生平最得意的杰作。”这可以成为定论。

陈寅恪究竟通晓多少种外语。坊间流传着陈寅恪精通或者掌握十几门外语的说法。其实这是把语言和文字的意义，混为一谈。作者通过各种资料和陈氏好友的回忆，对陈氏的外语能力作了考证。毕树棠认为“陈氏学习多种文字，主要是为了阅读而不是用来写作。”程千帆说“寅恪先生花很多工夫学外语，主要是为了阅读。”在众多的外语中，他的日语、英语、德语的口语水平高，阅读能力强，但用这些文字写作，未必得心应手。陈氏能运用梵文、藏文、巴利文等文字来考订佛经，至于其他西域文字和中亚文字，恐怕只能认识或者借用词典能查阅资料而已。陈氏侄子陈封雄说：“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种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在他38岁以前取得的。”而且随着他研究重心的转移，使用这些语言文字的机会越来越少，外文水平亦应有所退化。这些考证和分析是比较客观的。

1949年，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去留问题上，坊间有多种传闻，甚至有说后来陈寅恪后悔没有去台湾。作者根据已经发现的史料，分析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认为陈寅恪慎重地权衡去留的利弊因素，最终决定留在康乐园从事教书和学术研究工作。这种分析有充分的史料作根据，因而其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20世纪50年代，坊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斯大林在著作中，引用过陈寅恪的文章，所以，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就向毛泽东询问过陈氏的情况，毛随即吩咐国内有关部门调查了解陈寅恪何许人也？经作者查阅过多种版本的《斯大林全集》，根本没有这回事，完全是以讹传讹的坊间传闻。

学术界都知道，1953年底，汪篯带着郭沫若、李四光签署的信来广州，请陈寅恪赴北京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写了《对科学院的答复》，婉谢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其实这是陈寅恪第四次婉谢北上。在此之前有过三次：1949年10月25日，婉谢叶企荪、吴晗电召他进京返清华大学任教；1950年第二次、1952年第三次、1953年第四次。后三次是关于到中国科学院任职事。许多人或者不知道有过四次的事实，把一些事情混在一起，以讹传讹。本书把这四次的时间、人物、事实梳理清楚，有利于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其功莫大焉。

陈寅恪在中山大学生活了20年，为中山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是中山大学教授写的至今为止最详尽、最客观真实的陈寅恪传记，很值得向读者推荐。尤其是吴定宇教授带病坚持写作，推出如此厚重的作品，其敬业精神，令人钦佩。

本报编辑：彭楚裔 徐津阳 卢旖维　编辑部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南校区大钟楼三楼　电话、传真：84111991　邮编：510275　承印：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